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元生

80年代过去了,90年代到来了。在这新的年代里,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作一番回顾与展望,是很必要的。

一、回顾——八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成就与缺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正如黄宗忠同志所概括的:“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图书馆学研究最繁荣的黄金时期”,“出版著作一百多部、期刊几十种;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和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以及市县级图书馆学会九十多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由1978年的两个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绩显著,现已出版的专著和教材达六种之多。”^①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图书馆界广大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辛勤耕耘的结果。

在总结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所取得的很大成就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或明显的缺陷。对此,黄宗忠同志的看法是:“图书馆学研究去向不很明确,研究课题比较分散,讨论的问题不够集中,论述的内容显得一般化,新的见解不甚多,理论研究难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问题”;^②惠世荣同志的观点是:“当前图书馆界主要的问题是工作中的浮夸和理论研究中的华而不实”。^③可见,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本文在这部分就这个问题作些具体分析,因为这种分析有助于这门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我认为,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缺陷,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的指导思想有时有些偏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确立得不够牢固,或者说坚持得不够一贯。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近十年来,特别是1987年以来,由于受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少,讲波普尔、马斯洛的多;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研究的少,用西方理论观点指导研究的多。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流连忘返,奉为金科玉律,不加任何分析和鉴别,便全盘引进,横向移植到中国图书馆学界。例如:1982年前后,“有人提出波普(即波普尔——笔者注)的‘三个世界’理论可以作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理论基础”。^④又如,对国外文献计量理论的介绍,往往“夸大,宣传吹嘘得过分”,“把它们复杂化,玩弄数字游戏”。^⑤

二是在研究中弘扬的少,否定的多。近年来,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学者食而不化地盲目崇拜西方思想和人文价值,鼓吹西方中心论,大而无当地骂祖宗、挖祖坟,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受其影响,图书馆学界也出现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一些研究者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总结我国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弘扬传统图书馆学的精华,而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指责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如何封闭、如何落后、如何“僵化”、如何充满“危机”,企图全盘加以否定。例如,有的文章,不是用“封闭”一词,从骂老子管理的周藏室开始,一直骂到近、现代的图书馆吗?又如,在目录学界,不是“有人要把目录学的‘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当作包袱丢掉,认为研究目录学史是一种偏向”吗?^⑥可见,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只否定、不弘扬或否定多、弘扬少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

三是在研究成果中,坚持马列观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出版物(主要指理论著作和学术论文)少,忽视马列观点,胡乱套用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及一些热门学科的新名词、新概念的出版物多。图书馆学研究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绝大部分研究成果要表现为出版物。一位党员理论工作者指出:近些年,在文艺和美学领域,“坚持西方观点的出版物比夏天的蚊蝇还多,坚持马列观点的出版物比早晨的星星还少。”(引自1989年8月29日《光明日报》)图书馆学领域虽远远没有这么严重,但上述那种一多一少的现象确实存在,人们只要细心翻一翻这些年来图书馆界的出版物,就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第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些不当,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重纯理论、纯学术研究,轻开发应用研究和现实研究。近十年来,有的研究者为了拔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片面追求理论上的玄奥,往往以让人看不懂为高明,以远离现实为光彩;在他们的文章中,堆满了自己津津乐道的新概念、新思维、新定义,摆满了读者难以看懂的函数、参数、公式等;有的研究者或者故弄玄虚,把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反复探讨,或者搞拟外之作,生搬硬套西方的一些名词术语,夸夸其谈。客观地说,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的纯理论、纯学术研究,确实是空前的繁荣、空前的兴旺,但不少研究成果往往只有理论的光辉,没有实践的意义。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图书馆学界的开发应用研究与现实研究遭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冷遇,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取得多少大的突破和进展,如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文献资源共享,图书馆网络建设,等等。

二是重阐释性、整理性的研究,轻探索性的研究。我国著名学者王元化教授曾把理论研究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阐释性的,即对某一问题的某种观点加以说明、引伸和发挥;第二种是整理性的,即根据某一课题,搜集有关资料,辨别真伪,进行考辨;第三种是探索性的,即对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进行创造性的研讨,或对前人已有的结论进行突破性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参见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近十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是前两种居多,后一种甚少。如:介绍、宣传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各个大师、各个学派观点的文章比较多;编制的各种书目、索引、资料汇编、中外名词术语对照等也比较多;相比之下,有创见性的文章、有理论深度和力度的著作却较少。

三是重书本、轻实践。一些研究者往往从书本上寻觅研究热点,空对空地探讨,大而化之地议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四是重“软件”研究,轻“硬件”研究。这里所说的“软件”与“硬件”,是借用计算机科学中的两个概念,是一种借喻。就图书馆学来说,“硬件”研究是指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进行实打实地研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硬件”来——如方案、方法、途径、措施等等。“软件”研究则不然,它只是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作一些抽象的描述、空洞的思考、逻辑的推导,所得出的“软件”(即研究的结论)尽管娓娓动听、振振有词,但绝大多数只能束之高阁。近些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由于重“软件”研究,轻“硬件”研究,出现了“软件”多、“硬件”少的现象。如关于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就是一种典型的“软件”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十分热烈,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但有多少“发展战略”付诸了实施,产生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学风和研究风气有些不正,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表现也有如下几种:

一是缺乏严谨认真的学风,轻率地提出建立什么学、什么学。近些年来,一些研究者很不严肃,信口言“学”,见诸报刊的就有“图书馆哲学”、“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经济学”、“图书馆法学”、“图书馆人才学”、“图书馆电子学”、“图书馆时间学”、“图书馆色彩学”、“图书馆未来学”,等等,恐怕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名目繁多的“学”,表面上似乎给图书馆学增添了几分“繁荣”景象,实则搞得人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二是不作艰苦深入的探讨,满足于浅层次的重复。1987年4月,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主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哲学会议上,苏联《真理报》顾问凯里莫夫尖锐批评了“天下书籍一大抄”的倾向。他说:“著作如潮水涌来,其中一切都正确无误,然而却没有任何新意,没有自己的见解,新信息量几乎等于零!”(转引自“三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评价标准”,《图书情报知识》1988年第4期)回顾一下这几年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情况,此种现象恐怕是比较突出的。如图书馆有偿服务研究、各种反思或思考性研究,还有前面提到的发展战略研究,等等,尽管研究者蜂起,文章叠出,但有多少人作了艰苦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新的信息?

三是有些虚张声势,过份地标新立异。一些研究者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新”,把图书馆学、文献学这些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新思维”光圈,使之不食人间烟火,远离中国国情。

四是有些“文革”遗风,“假大空”的现象时有发生。翻开近些年来出版的一些图书馆学刊物,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某些文章空话、套话、大话、废话连篇累牍;如果去掉这些“话”,所剩的内容恐怕就无几了。可以说,“水份”过多,可读性差,是一些图书馆学研究文章的通病。

综上所述,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确实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的出现,既有受国际、国内大小气候影响的原因,也有图书馆学界自身的原因。当然,这些缺陷大都是这门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在发展中、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对此,我们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在90年代加以引导和克服。

二、展望——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进展

图书馆学研究是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必需。90年代,我们要大力推进图书馆学研究,使它更好地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工作的开展。为此,应当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图书馆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切实解决好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这两句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血的结晶,是一再为历史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早在1979年春,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阐明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题中之首义,也是4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建设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我国的图书馆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学,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去建设它、发展它。如果用西方资产阶级理论作指导,那它就会完全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前些年,由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确立得不够牢固,或者说坚持得不够一贯,出现了某些理论混乱和思想混乱。进入90年代后,我们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研究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目前,我们要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比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通过学习,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底逐步深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结合图书馆学研究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把图书馆学研究不断推向前进。这样,我们就能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2. 要多发表和出版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研究文章和著作。图书馆学的研究文章和著作是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编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面对坚持马列观点的成果是开绿灯还是开红灯,关系重大。要鼓励全国几十种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多发表用马列主义观点作指导的研究文章,鼓励有关出版社多出版这方面的著作。

3. 引进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和思想要适度。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引进了西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些理论和思想,这对开阔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知识,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起了有益的作用。今后,我们还应该继续这样做。为了把引进工作做好,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凡事皆有度,失度则失误。这里所说的适度,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极吸收外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和思想,不能采取封闭抵制的态度;二是要善于分析比较,谨慎选择,不能滥引乱进,更不能喧宾夺主,用西方理论来动摇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

第二,着力开展探索性研究,切实提高图书馆学的研究水平。

著书撰文,贵在一个“新”字,难在一个“深”字。而要达到“新”和“深”,就要靠探索。前面谈到王元化教

授曾把理论研究分为三种方式,同时,他强调“特别要注意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引自1989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图书馆学领域,有深度、力度和新意的探索性研究成果是有一些的,如黄宗忠撰著的《图书馆学导论》,彭斐章、乔好勤、陈传夫合著的《目录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进入90年代后,我国图书馆学界要着力开展探索性研究。

1. 选择好研究课题。

著书撰文,切忌选题陈旧。一个好的选题,能对实践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推动力,能使研究者废寝忘食,全力以赴。对于探索性研究来说,选题尤为重要。就我国图书馆界的情况而论,以下一些课题是很有必要进行探索的。

一是图书馆管理。这个课题涉及到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研究好了,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的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图书馆工作效率不高,主要是管理落后而不是设备落后所造成的;就公共图书馆而言,省级馆的设备普遍要比地市级馆先进,地市级馆又要比县级馆先进;但馆藏书刊流通率却恰恰相反,县级馆为117.1%,地市级馆为93.6%,省级馆只有30.8%。如果把这些馆的流通率与国外一些图书馆作横向比较,则都显得偏低或很低(如美国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早在1911年就达到了400%,那时该馆的设备不见得比我们今天先进多少)。(7)可见,我国图书馆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管理方法亟待改进,我们要花大气力对这个课题进行探索研究。

二是图书馆创收。这几年,“创收”成了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创收活动方兴未艾,势头越来越大。对此,有的人迷惑不解,拭目以待;有的人兴高彩烈,跃跃欲试。究竟如何评说图书馆创收,怎样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反复探索。80年代,谭祥金同志曾就此课题撰写了一篇优秀之作(即“论图书馆创收”,载《图书馆》1989年第3期)。90年代,我们期待研究者围绕这个课题,写出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说服力的探索文章,以指导我国图书馆创收活动健康开展。

三是图书馆的情报服务。应该说,情报是图书馆的最大优势,履行好情报职能是图书馆的主业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图书馆的情报服务作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很多图书馆的情报服务并不尽如人意,效果也不显著。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围绕这个课题,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使图书馆藏书尽其用,情报畅其流。

四是图书馆事业的立法。这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件大事。有了图书馆法,图书馆事业就能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前些年,很多研究者就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今后,我们要结合国际国内的新形势,进一步深化研究,争取在90年代能产生我国第一部图书馆法。

除上面列举的四个课题外,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只要我们把方向看准,把课题选好,探索性研究就一定出成果。

2. 注重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探索。

有人说:“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论的探索”。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要发展图书馆学,就必须有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图书馆学导论》之所以写得成功,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作者“在继承过去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并“力图使其在自己的著作中得以灵活的应用”。(8)90年代,我们要根据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着力探索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可以预言,随着探索的深入和这个体系的日臻完善,一批优秀之作将应运而生。

3. 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常言道:“一花独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古人云:“石本无火,相击方显灵光;水尚无华,相荡方现涟漪。”古往今来,学术思想的交流撞击,激发出了多少新的思想火花,产生了多少新的发明创造!在图书馆学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是有一些的(特别是百花齐放比较好),90年代要大力提倡,特别要在几十种专业刊物上开展学术争鸣,鼓励众多的研究者探索创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在探索中,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争鸣,通过学术争鸣取得共识,接受真理。

4. 注意更新观念。

为了着力开展探索性研究,90年代要特别注意更新(克服)两种观念(思想)。

一是师承观念。我国古代经生注经须墨守师说,疏不破注,背师说即不用。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崛起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有的成果颇丰,有的崭露头角,成为后起之秀。由于种种原因(如师生关系等),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师承观念,以古代经生注经方式去对待前辈或老师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不敢提出异议,也不敢有所超越,这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代学者戴震就说过,倘无确凿证据,虽父师之言不信。我们要更新传统的师承观念,鼓励中青年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大胆探索,着力创新,超越老师,超越前人,把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是急功近利的思想。近年来,一些图书馆学研究者急功近利,企望一鸣惊人,一蹴而就,结果是事与愿违。众所周知,理论的功效往往不是直接的和短期的,只要是揭示了某种真象或发掘了某个真理,就会指导实践,造福于人类。而要揭示某种真象或发掘某个真理,就要作艰苦的长期的探索。急功近利往往会造成学术上的短视。因此,要注意克服这种思想。

第三,大力加强现实研究和开发应用研究,切实解决好图书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谆谆告诫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要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图书馆学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提出四条思路。

1. 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

从总体上看,80年代我们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文献收藏理论为重心的。由于重心的主导支配作用,使得大家都十分重视文献资源的价值,片面追求藏书的“大而全”或“小而全”,而不重视其利用价值,导致大量的书刊资料在图书馆里“赋闲”,得不到利用,造成了文献资源的严重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转移研究重心,即把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研究,由以文献收藏理论为重心,转移到以文献利用理论为重心上。大家知道,文献资源的价值是绝对的、静态的,而它的利用价值却是相对的、动态的;文献资源的价值,要靠人类对它的领会能力和在实践中的利用能力来实现;离开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领会、利用能力,再有价值的文献,也只能是“死”文献、“闲”文献。例如,我国图书馆的藏书利用率平均只有30%左右,这就意味着有70%左右的文献没有实现其价值;又如,近年来我国推广应用的科研成果项目,还达不到总数的10%,有90%的科研成果在用户和科研部门的“夹缝”中游荡,成为“礼品、展品、样品”(参见1989年12月7日《经济参考》),难以实现其价值。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再不改变这种状况,图书馆就会变成“死”书馆、“闲”书馆。80年代,国内外情报界面对情报吸收率低的问题,提出了转移情报理论研究的重心和情报工作的重心。1984年9月,在海牙召开的国际文献联合会第42届会议上,大会主席盖茨说:“我们有责任更多地注意情报的需求,而不是情报的供给”(转引自《图书情报知识》1988年第2期)。在国内,有研究者撰文认为:“情报学的发展走向问题——是继续沿着情报传递理论方向发展,还是转向情报利用理论方向发展,这是情报学面临的重要选择”。这位研究者还认为:情报工作呼唤着情报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即由情报传递理论转移到情报利用理论方面来。⑨事实上,80年代,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工作重心已开始转移,如日本的科技文献中心就开始向思想库转变。我国图书馆学界要认真借鉴国内外情报学界的研究成果,把文献利用理论作为90年代研究的重心,加深研究的深度,扩展研究的广度,使我国各级各类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得到充分的利用,使一些图书馆购置的现代设备和开发的新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

2. 确定一个大致合理的研究比例。

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对学科前沿的各种学术问题、理论思想、改革方略等展开的探索性研究,三是面向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现实研究及新技术、新设备的开发应用研究。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相互联系,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它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各自要占多大比例呢?根据我国的情况,大致可确定为3:2:5。即:基础理论研究占30%左右,探索性研究占20%左右,现实研究和开发应用研究占50%左右。90年代确定这样一个研究比例,并按这个比例去组织研究力量,落实研究任务,大体上是合理的、可行的。因为,实施这个研究比例,既增强了图书馆学发展的后劲,又从研究力量上较好地解决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能够使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当然,随着研究的进展,对它可以作些适当的调整。

3. 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

图书馆学研究同一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必须以理论的社会效益作为评判的核心。就这门学科而言,其理

论形态是否完善远不是最重要的;就某个研究者而言,他有多少论著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理论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如何。因此,必须确立以社会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范并思同志撰文认为:确立这种理论价值观,势必导致图书馆学研究从发展战略研究走向政策研究,从教学需要型研究走向事业需要型研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⑩。这正是90年代我们所期待的事情。

4. 坚持研究人员同实践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

我国南宋诗人陆游有两句诗说得很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图书馆学发展的动力,来自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它的需求。而要了解、把握这种需求,研究人员就不能仅仅只靠“纸上得来”,必须到实际中去“躬行”,同实践相结合,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相结合。以往,有些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总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找不到“知音”,有一种理论“过剩”感;很多图书馆实际工作者,又觉得找不到合适的专业理论来指导具体工作,有一种理论“饥渴”感。要改变这两种状况,就要坚持上述两个结合。

第四,树立良好的学风和研究风气,把图书馆学研究稳扎稳打地推向前进。

90年代,在学风和研究风气建设方面,要深切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1. 力戒焦灼躁进。

毛主席说过:“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以往,有些图书馆学研究者就缺乏这种态度,焦灼躁进的心态比较突出,前面提到的一些研究者信口言“学”、虚张声势等,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为了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我们要力戒焦灼躁进。

2. 防止过份地标新立异。

江泽民同志1989年12月19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鼓励和支持科技人员在实事求是基础上提出新理论、创立新学说、探索新领域”。对图书馆学研究也应当如此。但是,我们不能把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探索创新与过份地标新立异划等号。所谓过份地标新立异,实质上就是崇怪炫异,要花架子,是一种嗜痂成癖的病态反映,是违背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的。一些文艺评论者指出,前些年,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朦胧诗、“后新潮”等,是一种过份标新立异的病态文学。本文前面提到的一些研究者把图书馆学、文献学罩上一层层“新思维”的光圈,恐怕也是一种病态的研究。还需要提及的是,即使是对于新理论、新学说、新领域的探索研究,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能把话说过头。

3. 要多弘扬,少否定。

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反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是积极吸收、弘扬光大,还是妄加指责、全盘否定,这既是个思想立场问题,也是个学风和研究风气问题。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我们要切实改变80年代对传统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工作只否定、不弘扬或否定多、弘扬少的学风和研究风气,理直气壮地弘扬其精华,同时摒弃其糟粕,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4. 要有一个好的文风。

文风是学风和研究风气的重要内容。古往今来,文贵清新自然,雕琢则是文章之大忌。唐代大诗人李白推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风,南宋大诗人陆游认为“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为了增强理论文章的可读性,我们要大力提倡一个好的文风,这就是清新自然,朴素易懂。

注释:

①② 黄宗忠:《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去向》,载《图书情报知识》1988年第1期。

③⑤ 惠世荣:《去浮求实,去虚存真》,载《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1期。

④ 引自刘植惠《试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一文,载《情报学报》1989年第3期。

⑥ 引自彭斐章《评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目录学研究》一文,载《图书情报知识》1989年第3期。

⑦ 肖远:《公共图书馆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载《图书情报知识》1990年第1期。

⑧ 何善祥、韩菁:《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新层次、新高度》,载《图书情报知识》1987年第1期。

⑨ 李学英:《试论情报理论研究的重心转移》,载《图书情报知识》1988年第2期。

⑩ 范并思:《确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载《图书馆》1989年第1期。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